

地方文献、文化记忆与名物纪胜： 宋代博物学视野下的洛阳*

王莹

提 要：洛阳作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是地方文献的重要书写对象。宋代尚雅与尚博的时代风气的濡染，使地方文献意义上的宋代洛阳博物学著作，呈现出科技与人文历史的多学科融合，在承载记录地方风物的功能之上，还延展了补述前贤之所未尽、彰显个人审美理念和文本创新、标举心系社稷之家国情怀等多重角度，使宋代洛阳的博物学著作，成为地方文献、文化记忆与名物纪胜的三位一体。

关键词：宋代 洛阳 地方文献 博物学 文化记忆

宋代的博物学，是地方文献、文化记忆与名物纪胜的高度融合，是视界与感受的统一体，不仅应和了当时“尚雅”和“尚博”的士人风气，更是一种有别于前代的知识疆域的汇通。“‘博物’是古代士大夫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也是内化入他们灵魂气质的文化情怀，与古代士大夫的日常的政务生活、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活动息息相关……博物学在后世的发展中，对象逐渐超越《诗经》的范围，向着更加广阔的自然和人文世界迈进，宋代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玩物时代’的开始。”^①

宋代关于洛阳的博物著作，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杰出代表。司马光在《过故洛阳城二首》其二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②对洛阳作为古往今来兴亡交替之表征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高度肯定。因此，关于宋代洛阳的博物学著作的价值，自是不言而喻。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丘璿的《洛阳贵尚录》（10卷，已佚），张岫的《洛阳花谱》等，均是宋代洛阳珍贵的地方史史料和名物纪胜读本，留下了中华民族至美的文化记忆。其中尤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最负盛名。

此类宋代文人的博物著作，将深刻的哲学思辨寓含于人文地理和自然风物之中，使文本涵盖丰富多元的知识领域的同时，又饱含诗化的美感特质，与撰写者本人的其他诗词文赋作品，构成了饶有深意的互文关系。

一 宋代洛阳牡丹谱录的学科融合与文体创新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一诗中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③而宋代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宋诗词中的生态审美与中国文化精神》（项目编号：13CZW039）阶段性成果。

① 沈扬：《审美·博物·追忆——〈洛阳牡丹记〉中的私人情境》，沈松勤、马强才编：《第九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4—265页。

② 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二首》其二，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第1册，第307页。

③ 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阳博物著作中之翹楚，亦出自他手，其博物谱录类著作《洛阳牡丹记》即是众所周知的传世之作。尽管在这部书中他不同意洛阳因地理位置居中而得天地中和之气，因而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但他也承认洛阳的地气与牡丹这一自然芳物之间有着不可捉摸的大自然的造化之功：“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有偏气之美者，独具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① 与其诗句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呼应。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体现了一种立足于牡丹这一具有盛世象征的名物符号，去记载一种至美的文化记忆的谋篇思想，而这种与地点密切相关的记忆又与其自身经历融为了一体：“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缙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早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②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三月，此时的欧阳修24岁，至洛阳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做推官，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与尹师鲁、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幾道等人结为七友，北宋王辟之的《澠水燕谈录》留下了他们宴饮交游的珍贵记录。而《洛阳牡丹记》作于北宋仁宗皇帝景祐元年（1034），当时的欧阳修可谓风华正茂，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的这段话，纪念的就是这段美好的岁月。《洛阳牡丹记》可以说是他刻意为之的盛世记录，这其中包含着国家和个人的双重意旨，是国家盛世和个人盛年的经验重叠。而将牡丹作为书写对象，则包含了另一重明确的对于至真、至尊、至美的价值取意点。诚如他在《洛阳牡丹记》中写到的：“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③ 他还在书中记录了钱惟演的话：“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④ 在肯定牡丹花王地位的同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此书作为名物纪胜的取向。从欧阳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牡丹被直呼为花，上承刘禹锡诗中的“真国色”，可见北宋对其爱重仍是至高无上。在当时的洛阳，牡丹的文化影响横跨雅俗两界，无论是在高层文士还是百姓的心目中，牡丹作为洛阳地方名物的至尊地位毋庸置疑。

作为一部杰出的地方文献，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之“花释名”中多引入风俗和故实，把牡丹这一自然物，与洛阳的人文地理和历史政治紧密结合，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结合了政治风云、文化审美与种植科技等多重元素的复合文本。如其“花释名”中对“牛黄”这一牡丹品种的释名：“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⑤ 这里不仅阐明了牛黄这一牡丹品名的由来，还提到了一段与宋真宗相关的故实。宋真宗赵恒曾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春正月二十三来到汾阴脍祭祀，此次祭祀时间长达3个多月，至夏四月初一乃毕，耗资巨大，共耗费约850万两白银。为了挽回北宋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宋朝皇权在百姓心目中的绝对权威，宋真宗选了历代帝王祭祀的风水宝地汾阴脍进行大规模的祭祀，以神化皇权。临行前，宋真宗还在其《汾阴二圣配飨铭》一文中，表

①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中华书局，2011年，第11页。

②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14页。

③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6页。

④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27页。

⑤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23页。

达了追古之意。汾阴脍以其特殊的地形被皇家选中，汾阴后土祠正式建庙始于汉孝武帝时。《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犢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脍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① 汾阴脍由此成为其后历代多位帝王的祭祀重地。而宋真宗这次旷日持久的祭祀，使其在此期间途经洛阳淑景亭驻蹕享宴时，由民间牛氏借机进献了这种牡丹，于是“牛黄”牡丹名扬天下。由牡丹的花期，就能推断出这段帝王行迹的发生时间，这段由牡丹释名牵出的帝王行迹，便成为珍贵的洛阳地方文献。

根据欧阳修的记载，可知，《洛阳牡丹记》中的牡丹品种之命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牵涉帝王行迹，还与朝廷重臣的宦海浮沉有着重要的联系。如《洛阳牡丹记》中记载的两种牡丹鞞红和献来红，都与为相21年的北宋名臣张齐贤的宦海沉浮有关，特别是鞞红更成为一个被宋代文坛大家苏轼、范成大用来自喻其政治生涯的牡丹意象。“鞞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駝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鞞，谓之鞞红。”^② “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③ 第一则记载证明，鞞红牡丹最早是养在仕宦豪族的府邸，而后才在洛阳城中的百姓家传播开来。第二则引文与历史史实对接，发掘出植物命名中隐含的政治元素。张齐贤对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极大贡献。赵匡胤、赵恒两位君王都曾给予其高度评价，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儒也都对其赞美有加。北宋牡丹的重要品种中，至少有两种与张齐贤有关，足可见其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影响。根据历史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张齐贤换任回朝，请求归家养老，以司空衔退休。回到洛阳，购置唐朝宰相裴度的午桥庄，从此过着喝酒吟诗，悠闲自适的致仕生活。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张齐贤无疾而终，终年72岁。因此第二则引文发生的时间，当在1011—1014年之间。因此，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的记述，也由重要政治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牡丹品种的名称生成界定了重要的时间区间。在记载历史故实的同时，也有着突出的植物学价值。

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对牡丹风俗的记载，则有着突出的史料价值，如：“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④ 可知当时的牡丹栽种之盛及牡丹植物学的普及。“大抵洛人家家有花”^⑤，又为北宋西京洛阳的爱牡丹、赏牡丹的风尚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

下面的这段记载，则包含着更大的信息量：魏花的发现和命名；拥有巨大池馆的魏氏以此花奇货可居，借以生财的轶事；魏氏池馆的盛衰，从往日魏花盛放观者云集，到后来破败出售，成为普明寺后僧人耕种的一片桑麦之地；花种由高层士大夫之庭园传至寻常百姓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栽种；蕴含时代高层文官对牡丹审美认知的，钱惟演对牡丹花王、花后进行品第后留下的语录……皆融会于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魏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

① 《史记》卷12《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461页。

②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29页。

③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30页。

④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25页。

⑤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55页。

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①恰如仇兆鳌对杜诗《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所评价的那样：“写一画鹰，而世之治乱，身之用舍，俱在其中，真是变化百出。”^②欧阳修笔下的魏花牡丹记载，正是给人以这般涵蕴丰厚、五味杂陈的阅读感受。

可以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构建起了一种独特的兼具科学、政治与人文多重意趣的知识谱系，并由此实现了文体的创新性实践，成为之后众多地方文献和博物学作者争相效仿的对象。

宋王观《扬州芍药谱》开篇中有言：“洛阳土风之详，已见于今欧阳公之记，而此不复论。”^③可见《洛阳牡丹记》作为洛阳地方文献在宋代文人心目中难以超越的高标价值，《扬州芍药谱》从书名到撰写体例，都明显是以《洛阳牡丹记》为参照。而欧阳修由《洛阳牡丹记》创造出的这种全新的文体模式，在成为重要的地方文献的同时，将地方文献与文化记忆、名物纪胜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实录之余极大地提升了文本的人文意趣，突出呈现了历史、社会与个人的多重负载，个性化的注入，使文本附着了强大的具有作者人格标签的精神气质和创作风格。诚如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所说：“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④

而从目录学上来看，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洛阳牡丹记》被归入子部谱录类。“谱录”一门由“南宋四大家”之一尤袤在其《遂初堂书目》中创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写道，它肇始于“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⑤“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⑥“谱录类”收录之书籍，皆成于六朝至宋以后，其中尤以宋最为突出，在总数145部848卷中，先秦至唐，只有6部8卷；宋代谱录书目猛增，达到48部260卷，拓展了博物学的巨大空间。

其中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这部著作在子部谱录类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欧阳修此书在当时就十分盛行，开启了其后文人撰写谱录著作的热潮，对宋代谱录的大量涌现具有极大的带动意义，其价值得到了宋代士人的广泛认可。它的巨大影响，可于其后应运而生的一大批谱录名作的序言中清晰可见。

宋代问世的谱录其作者大多在自序（跋）中言及此书，或在正文中以各种方式提及此书。并于宋代就形成了欧阳修之于牡丹恰如陆羽之于茶的文化定论。且看杜绾《云林石谱》的序言：“窃尝谓陆羽之于茶，杜康之于酒，戴凯之于竹，苏太古之于文房四宝，欧阳永叔之于牡丹，蔡君谟之于荔枝，亦皆有谱，而惟石独无，为可恨也。云林居士杜季阳，盖尝采其瑰异，第其流品，载都邑之所出，而润燥者有别，秀质者有辨，书于编简，其谱宜可传也。且曰幅员之至远闻见，或遗山经地志，未能淹该，遍览尚俟讲求，当附益之。居士实抑堂先生之裔，大

①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26—27页。

②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2页。

③ 王观：《扬州芍药谱·后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④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⑤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5，中华书局，1996年整理本，第1525页。

⑥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1535页。

丞相祁国公之孙。余尝闻之诗史有‘水落鱼龙夜’之句，盖尝游湘乡之山，鱼龙蛰土，化而为石，工部固常形容于诗矣。读是谱者，知居士之好古博雅，克绍于余风，不忘于著录云。时宋绍兴癸丑夏五月望日阙里孔传题。”^① 引文中涉及的陆羽《茶经》、戴凯之《竹谱》、苏文简《文房四谱》、蔡襄《荔枝谱》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皆为谱录著作中的耀眼明珠。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无疑是宋代谱录创作风潮兴起的滥觞，杜绾的序言充分体现了该书激发起的宋代文人普遍的补述前贤之所未尽的精英意识，和以博物学著作的撰写来实现文化传承的创作导向。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虽然有着明确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但其中自然栽种科技知识与人文历史、地方风俗的紧密对接，运思奇巧、手法卓拔的学科融合与文体创新，又体现出了某种有别于前代的新视野。故其借由《洛阳牡丹记》这一复合型地方文献文本，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宋代博物学的领军人物，就显得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二 宋代洛阳名园纪胜的重旨复意与家国情怀

作为宋代最负盛名的博物学著作之一，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充分呈现了当时洛阳牡丹种植之广和风俗之盛。其中最著名且最被广为引用的段落当属下面这段引文：“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② 这段著名的引文，不仅是当时洛阳的风俗记，对于洛阳的人文地理，也留下了关于当时洛阳的五大牡丹名园的记载。其中，长寿寺东街、棠棣坊，都与南市相邻，与留守府甚近。欧阳修到任后，与谢绛、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遍游牡丹名园。

这就牵涉了另一个话题——物盛、空间与文士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皆融会于园林这一物之上。当时洛阳的官私园林之盛，天下闻名。正如邵雍在《春游五首》其四中所说：“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③ 因此，关于洛阳名园的话题，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博物学课题，甚至在历史的语境下显得不可或缺。李格非的著作《洛阳名园记》的问世将这一课题推到了一个罕见的思想高度，以其高屋建瓴的立意，令地方文献著作在融合文化记忆和名物纪胜的同时，还体现出了感时忧国、胸怀社稷的宏阔境界。

可以说，《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在批判唐代公卿恋物成癖的恶习的思想导向上，与欧阳修是一致的。《洛阳牡丹记》虽记录了牡丹的品种和与之相关的风俗，但因欧阳修本人并未占有大量的牡丹和足以栽种大量牡丹的庭园，也令其避免了如唐代李德裕和牛僧孺大加收藏奇石而引发的道德质询和批判，使文本具有了更为纯粹的审美特质。欧阳修本人显然对于恋物成癖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尤其明晰若当事人握有权柄的情况下，这会对声名造成巨大的损毁，在他的《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跋》中，他从这一角度，对如李德裕般不惜代价收集天下奇石的类似行为进行了抨击：“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其利害不能诱，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

① 杜绾、诸九鼎、高兆：《云林石谱·石谱·观石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② 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牡丹谱》，第52页。

③ 邵雍：《春游五首》其四，《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196页。

好奇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①苏轼、文全等人的诗中亦有相似的对牛李二人嗜石如狂的道德谴责意味。

据《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平泉在凿龙之右，其地仅可辨，求德裕所记花木，则易以禾黍矣。”^②可见，宋代公卿园林中的奇石，大多来自牛僧孺和李德裕当年的私家收藏，如果我们以这段文字对照李德裕的名作《平泉山居草木记》，便可知当年其平泉别业之众多花木的名色和来历，以及不可胜数的从名山大川所获的奇石。这也成为他日后饱受诟病的实证。杨晓山先生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中这样写道：“北宋的一种趋势，就是以唐代的石癖者为例来表达某些道德和哲学上的思考，特别是李德裕，他是最突出的批判对象。在宋人的印象里，李德裕简直是如痴如狂了。李德裕本人的作品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从他的《平泉山居草木记》里可见，他的藏石之富可谓无与伦比。”^③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的遥深意旨，就是从对唐代公卿醉心恋物而导致的无心国事的批判和反思中升华而来。并在文末以直抒胸臆的形式，将其忧思之“知言”表达了出来。

综观宋代的地方文献和博物学的复合文本，这种批判和警惕，在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并未明晰地呈现出来，而是在同为宋代洛阳的著名地方文献和博物学著作——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才将这种对恋物成癖与沉迷园冶的批判，对道德沉沦和家国兴衰的警惕，以显明的方式在文末以“论曰”的形式振聋发聩地直指出来：“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澠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④这段文字将园林、洛阳、天下三者的必然关联性提示出来，以曾经焰耀古今的大唐最终崩塌之教训，警醒当世公卿，牢记历史教训，以江山社稷为重，其先知先觉一直广受称誉。通过名园纪胜而表达心系社稷之忧思的独特文本构建，也将这部地方文献和博物学著作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这样写道：“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⑤如果我们以刘勰的观

① 欧阳修：《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跋》，乔万民、吴永喆注：《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

②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212页。

③ [美] 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第106页。

④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⑤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

点来审视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的运思立意，李格非在以地方文献和名物纪胜的方式记载当时洛阳 19 处名园之后的重旨与复意，就在于提出他日后被载入史册的著名论断——《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① 他的意旨就在于警醒当时的公卿大夫，当以国事为重，居安思危，以史为鉴，不可醉心园林，否则江山不保。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成书于绍圣二年（1095），其后二十余年，中原沦陷。李格非的名句也被称为“知言”。只是在《洛阳名园记》中关于洛阳园林的 19 处记载中，这“知言”是作为“隐”而存在，而通观全书，“知言”在作为结语的“论曰”中承载扛鼎之力直接道出，又成为全书最具光彩的千古名句，成为全书的“秀”之所在。

可以说，《洛阳名园记》所记载的 19 处园林，都是为最后的“知言”做佐证和铺垫，李格非选取的 19 处园林，在当时都名满天下，都隶属于公卿大夫或称富一方的巨贾，园主非富即贵，在选园视角上，本身就饱含深意。从富郑公园到吕文穆园的 19 处园林，富郑公园的主人富弼、赵韩王园的主人赵普、东园的主人文彦博、吕文穆园的主人吕蒙正等皆曾高居宰相之位，其余园主人独乐园的主人司马光、归仁园的主人李清臣、董氏东园的主人董氏等，若非朝中重臣即富甲天下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本身，就连同他们的园林一起，承载着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元素。

李格非在写到其中多个园林时，都提到了该园林曾属前代公卿大夫，如讲到归仁园时就说这里曾是“唐丞相牛僧孺园”^②，讲到苗帅园时就提到“得开宝宰相王溥园，遂构之”^③。讲到松岛时就写道：“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公丞相。今为吴氏园，传三世矣。”^④ 结合最后的“论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故实的记录并非闲笔，而是刘勰所说的“隐”，本身就包含着重旨与复意，旧时公卿大夫的园林易主，隐含着一种立足历史的深刻反思——无论人物的地位何等尊贵，对任何有形物质的占有都无法永恒，特别是当这种占有与社会的公共道德发生冲突时，私家园林的兴盛反而成为导致玩物丧志、社稷崩坏的凶兆和预警。为其最后以唐之衰落为戒，警醒当世王公贵族勿因沉醉物欲而丧国处处埋下伏笔。

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当然也有一般地方文献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如对当时风俗好尚的记录：“松岛”的开篇就是“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⑤。以及对当时洛阳人的园林审美理念的记载，“湖园”开篇就写道：“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⑥ 但李格非的独具特色之处，在于他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分别记录了 19 处园林，使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独有面貌和个性特征，令人过目难忘而绝不会混淆。

如“天王院花园子”，结合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来读，则更可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牡丹种植之盛，牡丹花匠行业群体的规模，和从业者居住相对集中的状况，天王院花园子可以说是当时洛阳最大的牡丹花市和种植基地，花开时节则有奏乐，人们看花终日流连，以致家不举炊：“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

① 《宋史》卷 444《李格非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121 页。

②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 45 页。

③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 45 页。

④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 48 页。

⑤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 48 页。

⑥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 52 页。

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黄、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① 其描述言语简洁，却充满了画面感，赏牡丹热潮的气息，千古之下仍扑面而来。但这样热闹的时光很短暂，牡丹花期一过，这热闹非凡的天王院花园子便又沦为寻常丘墟。李格非的文字表达之中强烈的对比和转折，本身就隐含着对于现实冷与热的审视和思考。

而《洛阳名园记》中最令人难忘的存在，当属司马光的独乐园，因为这个园林既非草木瑰异，亦非规模宏大，而是物因人著。独乐园在诸园中最为简素，但因为园主是司马光而得名，成为当时洛阳春时人们必游的景点。正如李格非在书中所说：“园卑小，不可与它园班。……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② 司马光的诗文《独乐园记》《独乐园七题》《独乐园二首》等诸多名作都对其独乐园进行了记载和歌咏，极大地提升了独乐园的文化地位和时代影响，当我们将司马光本人对独乐园的描写与《洛阳名园记》中的独乐园的记录进行对照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个人能够标榜自己的独特，其条件之一就是这种在私人领域内的对事物的占有。……从最基本的角度看，通过对事物品种和类型的特定选择就可以达到独特性的效果。……当占有表明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理想境界时，它的独特性就是最高形式的独特性。……安全地掌控一个小小的园林空间强于占有广大而危险的原生自然；……私人领域乃是个人独有的，但是私人领域的价值只有通过张扬才能得到完全的兑现。这种张扬可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展览，也可以是一种文字上的称赞。这种展示看上去常常像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与大众文化和流俗之见作对，尤其是涉及到审美趣味时。”^③ 司马光将自己的园子命名为独乐园，虽包含了无力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政，而只好独善其身的内心投射，但关于独乐园的命名，他却赋予了其极为高贵的精神重量和文化承载，并通过这一命名，成功地塑造了自我的理想形象。在其著名的《独乐园记》中，他这样解释独乐园命名的用意：“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④ 他在文中描述了作为私人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空间的园林，给自己带来的自由放达的自适体验。结合李格非书中的描述，便可知独乐园的命名及其存在，是司马光一种高标超拔的精神境界的载体。而李格非对独乐园素简的客观环境，与丝毫不输当时其他奢华园林的巨大声名之间的反差的特别强调，也体现出了其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认同。

从欧阳修和李格非的两部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博物学著作与众多诗文和大量史实的互文性关系，它们甚至无法割裂，但它们的创作旨趣又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最终将落脚点放置于感时忧国之上，则将同时作为地方文献、文化记忆和名物纪胜的文本，提升到了一种警世通言的境界，这在以往的博物学著作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充分表现了宋代

①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44页。

② 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51—52页。

③ [美] 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第215页。

④ 司马光：《独乐园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第5册，第205—206页。

士大夫文人胸怀社稷天下的精神高度。也证明了宋代的博物学著作，不但超越了前代对于名物品类的简单记录、释名和溯源，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思考和解读，注入了更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思想和更具普世价值的家国情怀。

结 语

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写道：“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即使是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也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①“我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记忆在自然状态下的最根本形式是遗忘而非回忆，而回忆、对过去本身及对其产生的研究和梳理的兴趣，才是需要被阐释的问题。”^②以此来观照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为代表的宋代关于洛阳的博物学著作，洛阳、牡丹与名园，构建起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记忆的世界，其文本的价值和对其进行深度解析的意义不言自明，历久弥新。

与宋代洛阳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的博物学著作，将人、地、物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勾连，在由地点构成的历史巨幕之下，人和物的生活与互动使地方文献成为鲜活的场景，而人对于物的记录和书写，同时也在构造着城市的文化记忆，沟通了历史与当下，令那些曾经最瑰丽奇异的美好凝固和定格，永不凋零。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一书中这样写道：“地点决定了人的生活以及经验的形式，同样人也用他们的传统和历史让这个地点浸渍上了防腐剂。”^③“由于时间的抢夺和毁坏而看不见的东西，地点却仍然以神秘的方式保留着。”^④

宋代洛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就是这样一个永不磨灭的文化记忆的场域。其中包含着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宋代关于洛阳的博物学著作，则承载着这厚重的文化涵蕴，携带着浓郁的博雅气息，在地方文献和名物纪胜之中，凝结成了一种亘古不灭的文化记忆。同时，作为时代文化巨匠的书写者本人，在最初的创作思想中，就有着自觉而明确的构建文化记忆的精英意识。这在其由独创性的文本营造出的丰富性、多元性，进而生成了超越于以往地方文献作品的重旨与复意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也令宋代的博物学著作成为了当时文人彰显自身学识、才情、审美等综合素质的一种创作形式。使地方文献意义上的博物学著作，在承载单纯记录地方风物的功能之上，延展了补述前贤之所未尽、彰显个人审美理念和文本创新、标举心系社稷之家国情怀等多重向度，成为地方文献、文化记忆与名物纪胜的三位一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德] 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② [德] 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63页。

③ [德] 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④ [德] 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359页。